



第四辑



祁阳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祁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祁阳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祁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祁阳文史资料》第四辑编辑委员会

主编：李麟书 蒋仲生

编委：（依姓氏笔划为序）

朱 桓 苏联民 张受录 周良学

桂 芝 桂兹孝 曾念渠

顾问：李谷秋 桂多荪 陶 钧

责任编辑：苏联民

封面设计：蒋太碌 封面题字：桂多荪

湖南省祁阳县印刷厂

字数：120400 正文页数：179 印数：1500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印刷

前 言

在迎接光辉灿烂的一九八八年到来之际，我们谨将《祁阳文史资料》第四辑这束山花，奉献给新的一年，奉献给各界的文史爱好者。

本辑选刊了各类史料三十篇，计十二万字。其中有《上海“八·一三”抗战回忆录》、《唐克强在汉寿县起义的经过》等重要政治军事资料，也有《建国前祁阳的邮政与电信》、《具有地方风味的祁阳小吃》等经济史料，还有《石达开围攻祁阳之战》、《祁阳大水灾年纪实》等珍贵历史资料，以及《祁阳花鼓戏》、《祁阳名医珍闻》等反映文化教育、医药卫生方面的史料，另外是本辑选刊的《漫谈路会、桥会、茶亭会、义渡会》等地方风俗史料，对于兴办公益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无疑是有益的历史借鉴。特别是本辑刊印了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王贵忱和陶铸同志的外甥刘志修撰写的两篇文章，以示对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同志诞辰八十周年的纪念。

本辑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史料真实，可读性强，除应感谢热心撰稿的作者外，对县内外各界热情帮助我们查证核实史料的同志和朋友，在此一并致谢。

自本刊在第三辑开辟《补充、订正》专栏后，收到不少读者、作者的来信，本辑刊登的四篇，主要是对上辑有关史实和排版错漏的订正。

在编辑过程中，尽管我们坚持求实、存真的原则，但由于水平有限，错误仍在所难免，敬请各界人士不吝赐教。

编 者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目 录

追念陶铸同志·····	王贵忱 (1)
追思一束·····	刘志修 (4)
上海“八·一三”抗战回忆录·····	唐克俭 (9)
解放前夕祁阳县立中学的“勤劳社” ·····	雷一声等 (13)
我在祁阳从事地下工作的一段回忆·····	柏克寒 (18)
《祁阳民报》的接收与移交·····	李兴、段翥 (21)
唐克强在汉寿县起义的经过·····	张守平 (24)
唐鑫其人·····	罗鑫、朱子模 (32)
祁阳的洪帮·····	廖时雨 (40)
“院房”、“团头”及其《乞讨歌》·····	黄 天 (52)
石达开围攻祁阳之战·····	张受录 (62)
“祁阳专科以上学校同学会”始末·····	林 虚 (66)
湖南省祁阳工业职业学校办校始末·····	钟山玉 (71)
祁阳大水灾年纪实·····	周良学等 (74)

祁阳县土地改革运动简况.....陈享琼(81)

建国前祁阳的邮政与电信.....李千森(88)

桂庆云和他自办的“文明铺邮局”.....李千森(99)

祁阳城关镇最早的浴室——新华澡堂

.....丁家达、黄良知(101)

具有地方风味的祁阳小吃.....桂友来(103)

漫谈路会、桥会、茶亭会、义渡会.....黄天(107)

大忠桥重阳赛春节.....王时越(113)

建国前祁阳的电影.....桂元生(117)

祁阳花鼓戏.....唐再生(121)

关于祁剧高腔的来龙去脉

——兼谈祁剧与吉安戏及东河戏的渊缘关系

.....邹子模(135)

漫话祁剧为新台演出的开台戏.....彭新高(144)

忆先父李泥巴.....李仁义(151)

也谈建国前祁阳的西医.....黄常汉刘乾(156)

祁阳名医珍闻.....县卫生志办供稿(161)

瑶家的长鼓和长鼓舞……………李冬虎(168)

纳带——瑶家青年的定情物……………李冬虎(170)

〔补充、订正〕

关于《模范小学和模范派》一文的商榷……………駱 遜(172)

读者、作者来函

一、秦建军同志来信……………(174)

二、吴剑清同志来信……………(175)

三、龙孔彰同志寄来的关于《祁阳矿观》

一文勘误表……………(177)

征稿启事…………… (178)

追念陶铸同志

王贵忱

回想起来，最初在东北开鲁聆听陶铸同志教诲，是在一九四六年秋冬之交，其时我十七岁。在此之前，也即是这一年的夏季，为了开展原辽吉一地委所辖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从部队中抽调一批有群众工作经验的老同志，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几个来学习的“小鬼”，参加曾志同志所领导的土改工作团，在内蒙古东科前旗搞减租减息运动。到了九、十月之间，由于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我们土改工作团就和东科前旗部分同志，跟着曾志同志先后经过通辽撤退到开鲁。到达开鲁之后，曾志同志北去不久，陶铸同志从白城子来到这里。他当时兼任辽吉军区政委，准备在此地稍事停留后，便到大沁他啦。在开鲁的留守部队，这时新组建起一个骑兵连，预备和五分区骑兵连同行护送陶铸政委到前边去。在开鲁领导后勤工作的一分区副政委黄永辉同志，同意我加入新编骑兵连，以便随同回到原部队的要求。记得是在此后的一两天，驻军的排以上干部集中在开鲁中学听陶政委的形势报告，到会的有五六十人。这是我初次见到陶铸同志，也是第一次听他的报告。他是中等身材，面容清俊而略见削瘦，目光炯炯有神，显示出刚毅、明快的性格，穿一件日本军用活动接袖大衣，仪表威严，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见老些，当时只有三十八岁，却象四十多岁的样子。操一口湖南乡音的普

通话，鼻音较重，比较容易听得懂。回顾起来，当时陶政委所作的形势报告的大意，主要是分析了国民党政府破坏停战协定，全面发动内战的局势。指出撕毁停战协定的不是我们，国际和国内舆论不支持国民党，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支力量强大的、久经考验的子弟兵，有幅员广大的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我们的回旋余地大。指出当前的整个形势对我们有利。国民党跟我们争夺大城市，我们不跟他们硬碰，暂时放弃了一些城市，叫他们高兴一时，这是为了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为战略反攻做好准备。陶政委在报告中还谈到他和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在黄埔军校和十年内战时期的经历，意在鼓舞我们的斗志和增强必胜信心。接着又综述了东北战场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变化，正朝着有利于我方发展。联系到我们一分区的形势，陶政委列举事例，说明国民党军队到处伸手，多占了几个城市，兵力更为分散，我们会集中力量逐个吃掉它，很快就要组织全面反攻，收复失地的。他的通篇报告简明切要，论例充分而深入浅出，是一堂生动的形势教育课，对我们鼓舞很大。

听过报告后不久，我们骑兵就接受护送陶政委到奈曼旗的任务，随即开始了向辽阔无际的沙漠地带的行军。当时这一地区土匪尚未肃清，在行程中时而听到有放“冷枪”的声音，而陶铸同志非常镇定，不为枪声所动，也不听劝阻，他和秘书骑着马时而放跑在队列的前边，有时也和我们并行，随意和大家谈家常。问我读过几年书，爱不爱看文艺作品？我说读书很少，有时候看点小说。他鼓励我注意学好文化，不要好高骛远，学习锻炼写些短的通讯报导文章，部队里需要这方面的报导。途中吃饭时，他和我们一道吃羊奶泡炒米，言谈和蔼亲切，没有一点架子，和几天前作形势报告时的严肃

神情判若两人。当部队行至八仙筒，陶铸同志在五分区骑兵连护卫下径赴大沁他啦，我们这个骑兵连则取道库伦，连夜赶至彰武县属哈尔套街参加一个战役去了。

星移物换，转瞬间已是四十余年前的陈迹。缅怀往事，虽说我亲聆陶铸同志的教导不多，而在内蒙古沙坨子行程中他寄予的关爱之意，是永远忘不了的。从那以后，我才开始学习试写小文给部队的报纸。进城以后，以志趣所向，我比较重视学习文史方面的知识，以至后来转而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发表一点论著文字，这和陶铸同志当年对我的教导不无关系。只是后来由于我在学习上不努力，又不谨慎，在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虚度光阴二十年，非但学术无何成就，其他方面也没有什么可以称述的。说到右派问题，在定案前后我一直想不通，于是，在一九六二年春曾经给老首长陶铸、曾志同志写过申述报告。不言而喻，在此后连续不断的运动中，我为了这一冒失举动招致了一些麻烦。然而，使我更为内疚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两位老人家为了我写报告的事又受到某些人的责难。事情总算过去了。对我来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被视为万劫不回的人，从未想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做人的权力。抚今追昔，我满怀热忱地感谢党！感谢关怀过我的已故的陶铸同志！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注：本文作者系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

追 思 一 束

刘 志 修

舅父陶铸诞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1908年1月16日），在我写这篇小文时，他老人家八十周年诞辰将届。逝者已矣，后生何为，往事深沉，历久弥清。谨以追思一束，奉献给爱我、养我、育我、教我的舅父在天之灵。

由于我自幼父母双亡，是在舅父身边长大的，所以舅父实际上既是我的严师，也是我的慈父。

我从小喜爱文科，在学校时作文向来不错，屡屡被老师拿出示范张贴。这里面也凝聚着舅父的心血。尽管他工作极其繁忙，仍每每在临睡前批改我的作文。记得有一次，我将落日的“余晖”写成“余辉”，他亲笔替我改正，第二天还向我讲解晖、辉二字的差别异同。舅父早年家道衰落，没上过几年学，十三岁即已离乡别母，到安徽芜湖一家木材铺当学徒。他完全是自学成才的。锲而不舍，聚沙成塔，就是他的治学之道。有一回，他手书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诗句赠给日本友人。题毕，谈起“轩辕”词义，秘书说是黄帝别名，我说是大车子，舅父说都对，还是查查《辞海》看有无其它义。一查，原来“轩辕”还可以是星辰或复姓。舅父高兴地说：“有《辞海》这个老师，真受益无穷！”后来当舅父抱恨终天，病逝于合肥某军医院一间小库房时，在他的遗

物中，除了马列毛著作外，赫然便有一部《辞海》。医护人员正是从这部《辞海》扉页上舅父的亲笔签名，才确知逝世的特殊病人就是陶铸。

六十年代初，“反修运动”已经在我们国家酝酿发动中。一次吃饭时，我问舅父：为什么叫修正主义呢？数学上的“修正值”不是必须考虑的吗？舅父答道：修正主义实际上是把马列主义正确的东西修改成错的，所以也可以叫“修错主义”。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年年选美女，这就是修正主义了。1966年初，“文革”爆发在即，舅父也将调中央工作。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不会向我们透露一丝口风。他只是要我天天看报，特别是《人民日报》，并告诫我“政治上不要糊涂”。北京的“三家村”被打倒后，全国各地也渐起效法，我很不理解，便问舅父。按舅父的说法，“文革”不过是“四清”运动在城市里的深入，无非是批判一些错误的观点，教育人民群众，纯洁革命事业，和以往的政治运动似乎并无什么不同。现在回想起来，舅父一如普通善良的中国人民一样，是抱着纯洁革命、献身国家的美好愿望被卷进“文革”的，正是这种宗教式的单纯以及其他原因，导致中华民族十年浩劫的可悲结局，而我则永远地失去了亲爱的舅父。

舅父个性刚烈，本色突出。凡和他接触过的人，都会留下鲜明的印象。他说话又快又急，行路来去匆匆，处事干脆利落。每当他回到家里，大门便被他开合得劈啪作响，地板便因他的走动而咚咚连声，整个静谧的家，遂因他热火一般的声势而活跃。作为一个普通的人，舅父也有他的缺陷，例如脾气急躁，性格过于刚直。诚如亮姐所谓：他的气质多属

“胆汁型”。我曾遍询舅父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众口一词，说他虽然性格刚烈，却从未对工作人员疾言厉色，每个人都能具体谈出他如何关心、爱护他们，教育、帮助他们，无怪乎“文革”中这些工作人员无一例外全成了“陶铸死党”。

我们家的保姆郑嫂，是来自广东清远的一位中年农妇。舅父待她如家人，将她的女儿送去工作，将她的儿子送去参军。有一年，郑嫂在体检中发现患有肝炎，机关管理部门准备让她离开我们家。郑嫂非常难过，暗中哭泣不愿离去。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舅父。舅父说，如有这种病再找工作也难，还是留下来吧，小心点也不一定会传染。就这样，郑嫂一直在我们家里工作，后来病也治好了。

警卫员小石机灵能干，舅父很喜欢他并有意送他去学习。熟料小石遭遇不幸，母亲去世，妻子也病了。于是他一心想复员，多次打报告要求回乡。舅父和舅母安慰他，同意他探家，教育他工作应从长远考虑。无奈小石归心似箭，只好让他复员。舅父后来还屡表惋惜，并请秘书代为汇款接济。亮姐曾告诉我一件事：一天深夜她被舅父的哭声惊醒，赶忙推醒他问怎么啦？原来是舅父想起一名牺牲的警卫员，以致梦中失声。这个警卫员的家属很长时间都是由舅父赡养，直到其妻改嫁。

司机李悦亭有一手好技术，解放前后曾给黄永胜开专车。他工作很不安心，成天要求下连队，后来调他给舅父开车。老李对笔者说，跟陶铸使我安下心来，因为他为人正派，心口如一，除了工作别无嗜好，起床就是上班，看报算是休息，一年到头除了开会就是下乡、跑基层。我既感动也

觉得充实，所以跟他后就没想过离开。后来你舅父曾特意安排我工作，我都不愿离去。他对我们从来不摆架子，嘘寒问暖，有说有笑，所以大家都很亲近他。逢年过节他总忘不了交代伙房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牙祭聚餐。但原则问题他从不让步。1959年清远县发大水，我们跟随他下乡检查、慰问。在一个小车站上铁路方面备了饭，还搞了盘驰名的“清远鸡”。他一见大发脾气，把站长和我们一齐训了一顿，说：老百姓遭灾没饭吃，你们还杀鸡！只吃了一碗白饭就走，并让我代他交二十元饭钱。

后来因年龄大了，老李调省委某处去当副科长，舅父仍一直关心他的工作和生活。郑嫂、小石、老李等同志，与舅父非亲非故，舅父对他们的关心爱护与教育，真诚地体现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博大仁厚的胸襟，因而赢得了工作人员一致的敬爱和永远的追念。

在十年浩劫中，舅父罪名之一就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上自刘、邓，下至公社书记，多在舅父所保之列。1966年舅父到中央不久，“四人帮”即拉拢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向刘、邓“开头炮”。舅父淡淡地说，我刚来中央不了解情况，不能说什么。结果谢富治发了难。唯有周总理和陶铸等一言不发。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一位与舅父共事多年的领导同志中肯地指出，陶铸被打倒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他在“文革”初期，为各省市和中央各部领导同志说了很多话，保了不少人，因而与“四人帮”不合拍，因而遭忌。另一位当年亲历的领导同志告诉我们：“文革”《十六条》原为二十三条，是陈伯达起草的。在修改定稿时，陶铸把江青揪“黑线”、“黑帮”的提法不客气地删了

去。对此，江青之流自然不能容忍。

保护相濡以沫的战友，保护肝胆相照的同志，保护党的心膂、民族的精英，舅父认为乃自己应尽的义务和当然的责任。他当时曾激愤地说：我保我所了解、熟识的国家领导和党的干部，这是一个政治品质问题，一个做人的起码道德问题！

“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就某种意义讲，我认为这其实正是对舅父在“文革”中所作所为的最佳褒扬。遗憾的是，他力不从心，很快连自己也成了可悲的牺牲品。

舅父含冤逝世后，侥幸发还了部分遗物，其中有十数张旧报纸，上面多是舅父毛笔手书的他自己的诗作和默录的唐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书手杜甫的《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记得当时我乍见舅父那独特而又久违的笔触，内心是猛然一震！自此，我就既偏爱又怯怕诵读这首杜诗。舅父逝世已经十八年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大约就是舅父九泉之下对幸存者和后来人的期望与遗愿吧，我想。

一九八七年九月

上海“八·一三”抗战回忆录

唐克俭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一声炮响，全国抗战的序幕揭开了。紧接着，侵华日军于八月十三日在上海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妄图牵制我驻南方的部队北调增援，以利其陆、海、空军联合作战。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军人为了洗滌民族的耻辱，粉碎战前日本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所谓“一旦发生战争，四小时即可了事”的狂妄叫嚣，冒着敌人的炮火，在上海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浴血奋战。这就是震撼中外的上海“八·一三”抗战。当时，我在陆军第十九师五十七旅一一四团任团副。该师师长李觉（长沙人），旅长庄文枢（江苏人），团长周昆源（祁阳人），都参加了这场抗战。现将亲历的抗战情况述写如下：

西安事变后，我师奉命沿湘赣、浙赣铁路线转移到浙江，驻金华、杭州、处州、温州一带。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八日，蒋介石派何应钦、顾祝同来浙江桐庐县检阅我师，勉励官兵爱国爱民，尽军人的天职。此后一星期，即将我师原有三个旅六个团整编为两个旅四个团，将编余的军官统一送回湖南训练保安部队，把改编好的部队重新整训，同时增发了一些新式武器。“七七”事变以后，上级命令将随军眷属遣送后方，统一包车送师部驻长沙办事处安排，以解除官兵后顾之忧。“八·一三”抗战打响后，我部奉命由温州经台州、象山到宁波，警戒海防，沿定海边区赶筑防御工事。一九三七年